

行走在守正创新与求真致用之间

——写在《夏振坤文集》出版之际

张艳国¹

中国文化始祖孔子说：“信而好古”¹，这是强调学术传承的重要性，有继承才有创新；古人又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重视学术发展源正流清，做到慎终追远。中国自古就有后学为前辈学者总结学术经验、学术思想与方法，并编辑整理选集、文集、全集、学术资料的文化传统，远者如《论语》《孟子》，近者如《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走向世界”丛书等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世代弘扬。如今，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编选并出版我国老一代学术名家标志性人物之一夏振坤研究员、教授的代表性成果，这是值得礼赞和肯定的，因为这对于梳理学术史、研究前辈的治学方法，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流派、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大有裨益。“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²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一定要依靠“大先生”组织、带头和引领，才能取得成功。

夏老师于1928年2月14日出生在江西省九江县（今柴桑区，2017年撤县并区）莲溪乡夏家村一户世代书香之家，小名夏宝钗，字冬日，至今沿用，夏老师将他的诗集命名为《冬日诗集》，在他的画作、书作上也留印“冬日”。学名镇坤，后改名为“振坤”，取《周易》之意。他在经历家乡私塾、家族小学、上海工部局小学、江西豫章中学（插班过紫阳中学）教育和接连的战乱及颠沛流离之苦后，于1947年8月在武昌考上了湖北农学院，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积极组织“护校反搬迁”斗争，获得成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担任校党委书记童世光同志的秘书。1951年暑假，他考取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研究生，主攻农业经济，毕业后拟留校任教，但因湖北省方面坚决要人，遂回武汉工作。回武汉后，夏老师为新成立的华中农学院（由武汉大学农学院与湖北农学院合并组建）及其农经系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参加系领导班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夏老师先后担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党组书记兼院长，院长，院学术委员会顾问。1996年他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受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院士和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之邀，出任该校经济学院首任院长。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工作期间，他创立了农业经济学硕士点、西方经济学博士点。

夏老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尤其在中国农村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和经济发展战略，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世界文明走向等领域，为推进教学改革、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同行专家、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尊敬；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具有崇高威望的国家级学科带头人之一，是为后学所景仰的“大先生”；他被学术界誉为才、学、识高度契合，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辛勤耕耘的“战略型经济学家”。

一、献身学术之路

人生的道路无疑是自己选择的，但选择人生行程的力量全在于他所处的时代，在于所处时代的具体环境；人们不同的处境，决定人的不同应对方式。在中学时期，夏老师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宣传的进步思想，并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革命书籍，思想倾向进步，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特别是进入大学阶段，他更加积极地在思想上向共产党靠拢，到1947年冬天，他的思想“已完全‘左倾’了”，“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和联合政府的主张，使我当时有如拨云见日，义无反顾”。1948年冬天，在共产党员鲁汉军同志的介绍下，中共汉口市委地下党组

¹作者简介：张艳国，南昌师范学院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研究”（LSYZD21001）首席专家，江西南昌，330032；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江西南昌，330022。

织负责人金本富主持了夏老师在汉口六渡桥茶馆秘密宣誓入党的仪式。这个历史细节一直镌刻在夏老师心里，历经 70 多年之后依然没有模糊，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我之所以誓言永远跟党走，绝不是‘随大流’，而是出于我的切身体验而作出的自觉选择。……对于党的初心与使命牢记在心，自觉地把小我放入到‘一切为了中国的现代化’的毕生追求中。”夏老师入党后更加积极地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在解放初期，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农业经济学专业知识，特别受到著名学者马哲民（1899—1980）、胡伊默（1900—1971）教授的悉心指导。而当时他亲历汉口解放，思想上受到极大震撼，他在诗中写道：“夏至寒收旧阙摧，大军漫野过江来。倾城空巷作狂舞，岁尽春临万卉开。”

从中国人民大学学成归来，夏老师感觉一切都是新的：新建立的家庭、新组建的学校、新成立的专业系，新上农业经济学的课程。他适逢新中国开始“一五规划”建设，整个国家欣欣向荣，朝气蓬勃，加上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文化教育仿佛进入了“科学的春天”。这种新的感觉和未来发展的新诱惑，如同李大钊在著名的《新的！旧的！》文章中所说的，一切都是新的！新青年打起精神，“想在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路径，创造一种新生活”，“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³。1956 年，夏老师的科研工作开始起步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结合当时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聚焦农业农村农民，发表了《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华中农业学院学报》1956 年第 1 期）长篇论文；随后又运用农村经济学的专业知识，关注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家庭副业，发表了《为什么不能轻视家庭副业》一文（《湖北日报》1956 年 8 月 10 日）。这两篇文章选题，正好构成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两个视角，形成关注重大理论与重点实践问题的两个类型。以此为开端，夏老师日后的学术研究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两个维度上展开，初露端倪和锋芒，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科研硬核。

个人的人生转折，其实与国家、民族、政党的命运往往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历史转折时期，一方面，夏老师“重新振作了起来”，有再一次“获得解放”的幸福之感，他“在管理农场的同时，参加了一些农经系的教学与农经系的农机学会活动，在国内、省内的刊物上开始发表了一些论文和进行一些农村调查，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老前辈们的关爱”。另一方面，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国家农业部 and 中共湖北省委也将夏老师的政治安排提上日程。经过几次三番“征求意见”和“交换意见”后，上级尊重夏老师“不愿做官”的意愿，将他调离华中农学院，不到省直厅局任职，而是到新复院不久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担任党组成员、副院长。就这样，夏老师在省属科研机构的领导岗位上，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他都积极地投身到反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中部崛起”战略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阐释与宣传之中。他围绕湖北发展战略进而研究中部发展战略问题，撰写了多篇调研报告，受到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国家机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批示肯定。他主持编写《农机化技术经济学》《中国农村经济学概论》《中国县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发展经济学新探》等多部教材，推动了高校、研究院所经济学领域教材编写质量提升，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学教材编写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围绕学术热点问题和改革发展的实践需求，出版十余部有学术影响的著作，代表性的有：《中国农业发展模式探讨》《生产力标准泛论》《论改革与发展》《摆脱迷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学术对话》《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与改革的理论探索》《绿色革命之路——大国农业发展理论与模式》等。1991 年，他被评为国务院津贴专家；2010 年，他被评为湖北省委省政府授予的首批“荆楚社科名家”称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在视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时，表彰夏老师与张培刚、章开沅、陶德麟先生等一样，是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面旗帜。

进入新世纪后，尽管夏老师年逾古稀，但依然对我国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持续跟进学术热点，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从哲学、文化、历史与科技发展的新视点，深刻地探索经济学研究的新路径、社科研究成果有效服务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形式，他在发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还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和论文集，如《时代潮流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多维视野——反思与前瞻》《发展与文明》《耄耋探索集》等。尽管夏老师目前已过鲐背之年，但他依然每日读书、思考、做笔记、写论著，“从不偷懒”，尚有未刊布的著作《新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未来》《新科技革命与社会变迁》《读史随笔》《温故知新集》《重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笔记》以及《夏振坤回忆录》《冬日诗集》等等数部之多。

社会科学的学术高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厚度是历史文化。因此，愈是后来，夏老师愈是尝试跳出经济学的传统视野和方法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走向哲学、政治学、文化学、历史学，乃至现代科技领域，寻求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途径与方法。他以新中国历史发展为纵向思维轨迹，以人类文明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形态与当代科技革命的兴起为横向思维依据，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问题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动态有机结合起来。他在研究中贯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力求做到“经济学要有新发展”，在很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新视域、新观点和新话语，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政治坚定、理论自觉、创新品格和文化情怀，也充分体现了一位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优秀学者的社会担当精神、追求真理精神和为民报国精神。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朝闻道，夕死可矣”、“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²的有机结合。

二、学术思想贡献

宏观地说，夏老师继承和发扬了马哲民、胡伊默、朱剑农（1910—1986）、宋涛（1914—2011）等前辈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整体性、指导性、实践性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国与外国相融通的优良学风，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研究和在实践中科学运用方面，既守正创新，而又求真致用；既有实践研究的理论高度，又具有学术研究的实践指向；既有遵循学理追求真理的内在逻辑，又具有学术研究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于实践问题的工具理性，又高扬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高度人文关切的价值理性。夏老师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路同行，实现了宽领域多方面的理论创新。这样一种理论创新，气势宏大，内涵丰富，具有实践的长久生命力，颇具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人文意境，恰如他在《高山流水》一诗中所抒发的意蕴：“沥沥岩头涧，渊源在远山。奔腾常不息，宁静赴春江。”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拨乱反正

实践的偏差乃至错误，来源于思想的混乱，本质上源于理论的错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围绕着为什么会犯严重的“左”的错误，人们痛定思痛后，开始进行深刻的思想剖析和理论反思。在当时的思想界，除了全国规模针对“两个凡是”而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外，还有一个很有影响的理论讨论，那就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倡导的“尊重价值学说，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思想观点，迅速在经济学领域形成批“左”反“左”的思想解放热潮。夏老师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参与到这场讨论之中，并发表了颇具震撼力的新见解。

忽视价值学说，违反价值规律，在经济领域总的反映是违背经济规律，无限放大人的主观意志，这在实践上就表现为“蛮干”，就会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蠢事。从理论深处看，就是迷失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谁是第一性的问题，违背了社会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客观规律。夏老师在《经济研究》（1982年第10期）发表《试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文章，老题新说，对于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科学论述，深化关于尊重价值学说和价值规律的讨论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发展正本清源起到了促进作用。

当然，在文章中，夏老师不是简单地复述唯物史观以及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而是聚焦“生产力如何作用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两个问题进行追问和阐释。这在当时，不仅是理论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上人们广泛关心的重大问题。夏老师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各自都有若干个内在层次，这些层次相互交错，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彼此紧密联系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内涵层、外形层和边缘层。在它们各自的内涵层外都有一个外形层，而在两个外形层之间又有一个共同的边缘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通过这个边缘层实现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无条件的；是间断性的，而不是连续性的。创造一个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良好条件，就必须是在生产关系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系统反馈”条件后才能实现，只有在生产关系的形式适合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实质上反映了经济行为在“权、责、利”三个方面的密切结合，使劳动者与管理者都关心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改善、运筹管理的合理化和劳动者本身素质的提高，从而培育、积累发展生产的内在动力。这些论述，

不仅对经济领域在理论上拨乱反正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也为当时正在全国展开探索的经济体制改革，围绕生产力发展正确适时适度调整生产关系，起到了理论支撑作用。

此外，夏老师还先后发表了《论农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层次运动与系统协调》（《农业经济论丛》第5辑，1981年）、《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与农业生产责任制》（《江汉论坛》1983年第5期）、《唯物史观与经济发展》（《江汉论坛》1997年第7期）等系列论文，并出版了《生产力标准泛论》专著予以系统论述。

（二）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时代性思考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与发展成为鲜亮的时代主题。从改革开放起步阶段过来的人都有切身体会：“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⁴由于改革也是为发展创造条件，促进发展，因此，从本质上讲，改革也是发展。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在发展的共识性上，人们是一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摆脱贫穷；“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更多地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⁴。在今天，这恐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常识了。但是，历史地看，过程性地看，这一共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在人们的讨论、争论，甚至是思想斗争之后才形成的；这个常识的获得，并被大家所接受，也是如此。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一扫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阴云和疑团。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也得力于邓小平的一锤定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⁴

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激烈争论中，夏老师冷静思考，周密论证，以极大的理论气魄在关键时刻发表了《计划、市场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一文，论证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都离不开计划和市场这两种经济手段，提出在当时不能排斥市场的社会作用，中国更多地是需要运用市场的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是当时跳出用姓“资”还是姓“社”的思维看待计划与市场，较早且最具代表性，最具权威性的论文之一。夏老师首先运用历史性、整体性眼光考量计划与市场在国家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地依靠国民经济计划或完全地依赖市场成功地解决了它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对于计划与市场，必须作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在中国，研究和设计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应当考虑几个原则性问题，做到排除两者的弱点而充分吸纳两者的优点，将立体性、交叉性与网络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立体交叉网络模式”⁵。他最后预言，“我相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必将在中国大地上发育成熟”⁵。正是在这年10月党的十四大上，党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取向，统一了全社会思想，极大地凝聚了人心。

此外，他还发表了诸如《经济发展战略新论》（《江汉论坛》1995年第2、6期），《经济发展中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2期）、《再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问题》（《江汉论坛》1996年第1期）、《试论发展的终极价值》（《社会科学动态》2017年第5期）等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出版了《发展与文明》专著。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夏老师在研究发展问题中十分重视中国历史文化、世界文明与哲学价值观，从而将历史、文化与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融汇到经济发展研究中，形成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话语，受到学术界重视。

（三）对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前瞻性研究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农业基础地位的牢不可动与绝对量农业人口的广泛存在，也就决定了我国在世界上是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面貌和实际国情。我国的改革也正是从农村破局起步的，农村改革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有力引擎。“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农业的发展状况具有决定性意义。”⁶四川、安徽、甘肃、云南、广东等地的农民自发探索“包干到组、包产到户”的做法，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就成功地

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幕。

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不是简单地甩农兴工,而是正确处理农业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实现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夏老师迎难而上,从改革开放开始,就关注、跟踪我国农村改革实践,并进行深入、超前研究,出版了《中国农业发展模式探讨》专著。他立足于我国农业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定性,从中国农业的范畴、结构出发,锁定中国发展模式的问题意识,遵循农业发展模式所具有的阶段性、层次性和整体性内在要求,揭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八种模式形态:适应农业模式、生态农业模式、三维立体农业模式、农工一体化模式、庭院经济模式、家庭经济模式、合作经济模式和村镇经济模式,最终走向城乡融合,从而消除城乡差别。在研究中,夏老师运用了结构分析理论与方法,即系统理论与方法,这在当时,其研究视野是开阔的,也是先潮的,因此,所得结论具有超前性就是必然的了。当下我们谈论农村发展,或者到农村旅游,一定要涉及生态农业、家庭农业和庭院经济,这已经是很平常的内容了。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理论上作出这样的创新设计,我们就不能不佩服夏老师的预见性、先进性。在该书出版之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致信夏老师表示肯定和祝贺,说“这是一本能跟上我国农村飞跃发展的书,它也预示了中国农村在21世纪要走的路”。张培刚先生也高度评价本书,他认为,本书的“突出特点是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总结我国农业发展30年正反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系统思维和动态思维的方法,吸收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中的丰富创造,提出了‘矩阵模式’的总体设想”;“这种分析与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创新精神”,标志着“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方面,迈出了有价值的一步”,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一个可供共同研究的样本,值得推荐⁷。

在成书前后,夏老师围绕我国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模式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论文,如《农业发展模式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85年第5期)、《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1985年第6期)、《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第9期)、《关于农民工浪潮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1989年第10期)、《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其实现途径》(《中国农村经济》1992年第4期)、《论新世纪的中国农业发展》(《华中农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等。这些论文,都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夏老师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三农”问题有效解决途径的设计和思想。

(四) 挺立时代潮流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入研究

中国自从鸦片战争起,虽然也做着现代化的美梦,但是,总是挨打,以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⁸。伟大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相辅相成,它们一起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题。如何追赶时代?如何实现现代化?从孙中山喊出时代最强音“振兴中华”,到我们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路上,正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既是一种实践创造,也是一种理论创新。夏老师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从事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应该说,夏老师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一方面是他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延伸与深化,因为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现代化问题”⁹;另一方面,也是他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驱使,“占人类五分之一的浩浩大军由农业社会迈向工业—信息社会,近十亿的人口由农村即将转入城市。这,不能不称之为有史以来的惊天之举,不能不把它看做是一股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未来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啊?新旧世纪交替,也激发了古稀老人的历史紧迫感和学术使命感,他说:“正当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奔向百年憧憬的历史目标之时,世界历史,又翻过了一页,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民族复兴之洪流,如何融入日新月异的世界大潮,借国际之新风,圆我现代化之旧梦,正检验着十三亿炎黄子孙的伟大智慧!”⁹夏老师敏锐地观察到,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工业化信息化新时代,这对现代中国来说,是搭上现代化末班车的绝好机遇啊!2005年,他的新著《时代潮流中的中国现代化》出版了。与从历史学角度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著作不同,夏老师主要立足于经济学的专业知识,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按他自己的定位,这是一本从属于发展经济学的著作,因为它是由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的讲稿脱胎而来。因此,该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研究的视角是力图站在时代发展新趋势的高度,把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的系统工程进行审视。第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从历史背景和国际背景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教训和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又是从制度选择、对外开放、农业基础、文化重塑等重大方面,系统探讨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第三,从研究的方法来说,它不是静止地就现代化论现代化,而是把中国现代化作为世界时代大潮流中的一个有机的巨大能量场的扩展而进行考察;它不是孤立地就经济现代化而讨论现代化,而是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维角度来综合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它不是局限于探讨现代化的硬指标,而是从现代化的价值

取向、思维范式和战略策略的宽广层面来探求中国现代化的理念与对策。第四，明确了中国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根据马克思主义所说“人的全面解放”的本质价值及其内涵，总的来说，中国现代化所应实现的目标应该是“四位一体”的，它具有丰富的内涵要素：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和平发展（双赢发展，人类进步），生态优化¹⁰。

在写作该书的过程中，夏老师还围绕经济发展与中国现代化专题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如：《中国现代化与精神文明建设》（《当代财经》1996年第7期）、《东亚崛起与经济发展》（《经济评论》1997年第4期）、《长江文化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与张艳国合作，《学术月刊》1998年第4期）、《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迟滞原因新说》（与占俊英合作，《中州学刊》2002年第1期）等等。

（五）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眺望人类未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己的道路”⁴，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夏老师较早地（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参与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研究，他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经济特征初探》的论文（《江汉论坛》1987年第9期）。他是在全国范围内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直奔主题，深刻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涵的学者之一。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与阶段性，他指出，现在来看，我们不妨估计，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会经历三个基本阶段：初级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对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进入成长阶段的时间可能要长得多”。关于中国国情及其制约性，他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条件，较之马克思当年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所依据的社会经济背景，在发展阶段上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主要体现在生产社会化水平低，物质资料的生产水平不高，社会阶层不仅没有分化为两大阵营，而且还有大量的中间阶层存在。在此制约下，只能“由初级阶段逐步过渡到成熟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指出，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谋发展，搞建设，必须紧扣其经济特征：一是在所有制上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二是在经营方式上实行所有制与经营权分离，允许多种经营方式并用；三是在分配方式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原则并行；四是在宏观调节上实行以间接调控为主、直接调控为辅，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最后，他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立场上强调，当无产阶级政党处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立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现实与目标之间，扎扎实实地建立起一个据点，“采取一系列中间的社会主义过渡模式，以期最后达到目标模式”。从学术史角度回顾，这是当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特征以及所应采取的经济政策，说得最清楚、最明白，也是最贴近党中央后来在有关文件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话语表述的文章之一。

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和理论立场上，为充分论证并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目标取向，夏老师又先后撰写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析》（《江汉论坛》1992年第12期）、《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释疑——兼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相容性》（《江汉论坛》1993年第10期）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的最大看点是，从确立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理论认识及其意义，重点说到实践，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改革发展将围绕市场体系全面建立、政府职能完全转变、企业制度全面更新、市场规范真正确立来展开。后一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在论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具有相容性的同时，揭示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应该防止的一些“误区”：防止“全民皆商”，坚持社会分工；防止“撒手不管”，坚持“职能转换”；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坚持配套改革。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伴随苏东剧变，国内思想上理论上出现了“社会主义还行不行”“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的疑惑与动摇，夏老师紧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和基本路线，坚信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前景无限广阔。他在《社会主义研究》《江汉论坛》《湖北日报》（理论周刊）等报刊连续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的历史思考》《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业绩》《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历史发展的常规性、变异性与社会主义》等系列文章，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部上，牢牢把握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时间与空间、成功与失误、原因与结果、内因与外因等重大关系问题，科学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人民性依据，牢牢占据了历史主动的客观性高地¹¹。

随着人类进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百年行程。如何看待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意义价值？夏老师发表《社会主义与未来》（《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5、6期）长文，他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为依据，论述“充满憧憬的未来”。他认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为坐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东方文明走向现代文明乃至为未来社会奠定基础的伟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将给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辐射”积极价值。他由此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回答为什么“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的重大课题。

此外，夏老师重视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特别是他将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湖北省情研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选择当中，他是最早构思并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的学者之一。“中部崛起”由省战略（1987年12月）上升为国家战略（2006年4月），这对于确立湖北在中部地区崛起中筑牢战略支点、走在发展前列的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学术情操、品格与方法

古人说：“文以载道。”这是说写文章是为了传播知识，追求真理的。低一点讲，是求知；高一点讲，是问道。文章不能白写，一定要有作者的思考、情怀和写作目的。又说：“文如其人”。这是指文章所表达的鲜活思想来自于作者的情感，文章的风格、情趣与作者相近或相似。文以载道与文如其人，相辅相成；好文章来自好思想，好思想来自好作者。因此，了解、研究作者的思想，必须了解作者本人，走进其内心世界。夏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自己是这样认识自我的：将有限的生命融入到“远无止境的认识”中去，与“深化认识”一路同行；将自己全部的人生内化为“永无尽头的学问”。他勉励自己：“做人，愿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做学问，愿经得起历史的推敲”。而他的同事、朋友、学生则是这样评价他的，譬如在庆祝夏振坤教授80华诞学术研讨会上，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院长、知名党建专家邓剑秋（1938—2011）在讲话中，从五个方面对夏老师作了刻画：“德高望重的长者，才高八斗的学者，敢于创新的勇者，思维敏捷的智者，宽厚大度的仁者。”这是十分准确、形象的描述，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我认为，这幅“画像”蕴藏着夏老师极不平凡的有高度、有温度、有厚度、有力度的人生追求、情操、品格、理想、信念、意志等要素。

几十年风风雨雨、大浪淘沙的锤炼，练就了夏老师笃定沉稳、忠贞坚守、勤思好学、踏实苦干的品格，形成了气场强大的人格魅力。古人表彰的“德艺周厚，其名必善焉”¹²，就是学品与人品的完美结合。夏老师将人品与学品熔铸在一起，显示出“唯有人品学自高”的高雅精致。他的每一篇论文、每一部著作、每一首诗歌、每一帖书画作品，无不飘逸着一种“玉树临风”“清风拂面”式的崇高美、刚健美、和谐美。年少时，夏老师保持独立人格；青年时夏老师坚守君子人格，说真话道实情，即使被冤屈也无怨无悔；中年时夏老师意气风发，坚定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祖国与人民心心相印、气息相连，“吹尽狂沙始到金”；老年时夏老师安享上天的赐予，修身养性，怡情乐生，“而不知老之将至”，他还在抒发“只争朝夕”的豪情。古人说，“真性情才是真英雄”；我认为，高品格才是真英雄。夏老师数十年劈波斩浪、负重前行而又轻松自如、得心应手，他生命的活力与创新的内力既来自于他独有的崇高品格，也来自于他特有的对未来的信心和憧憬。

夏老师老而弥坚，愈发明确自己的学术追求，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他在欢度古稀时进行了一番人生回顾和学术梳理，说道：“我来自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出身贫寒，童年丧父。饱受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我自幼就萌生了救国兴邦的强烈企望。直到今日，每每回想起青少年时代的国难家恨，就心潮翻滚，久久不能平静。”“也许是这种经历的熏陶，从青年时代至今，对于个人名利进退兴味索然，对于追风弄权更是深恶痛绝。爱吾中华，守我人格，与人为善，于己寡求。我的治学目标也由此而立：一切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凡是有关中国经世济民的问题，我都感兴趣。只要精力能及，我都愿意去钻研一番，以求究竟。”20年之后，他依然以“强大的动力、良好的心态、神圣的追求”坚守这一目标，雷打不动，“不为生而悬悬，不为死而戚戚。尽我应尽职责，做我想做之事。”

夏老师一生追求进步，他所从事的学术事业具有“追赶时代，跟上时代”、“与时俱进，与时代俱进”的鲜明风格；数十年来，夏老师在教书育人、社科研究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勤学不厌，诲人不倦，体现了“忧国忧民”的鲜明特征。夏老师的学术

人生十分丰满，极其精彩，“是一位始终站在时代最前列、置身于社会变革最深处思考问题，始终炽爱着学术研究并笔耕不辍的大学者，是一位具有学术厚度、实践深度和时代力度的思想家，他给予我们思想的营养，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认真研究。”¹³几十年来，夏老师孜孜不倦地埋头书海、乐此不疲地追踪实践，明事理，探学理，求真理，行走在守正创新与求真致用之间。守正，就是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创新，就是在继承中发展，用新思想、新概括、新阐述、新观点、新方法、新认识奋力推进学术研究。因此，守正是他治学的底色，创新是他治学的亮色。求真，就是探寻真知，做“真学问”，不哗众取宠，不人云亦云，“本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态度”，“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力实事求是”¹⁴；致用，就是用科学的结论、用思想的智慧启发人们，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因此，求真就是他治学的原则和坚守，致用是他治学的追求和目的。守正创新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求真致用是他学术人生的目标归宿。夏老师常用他自己在70岁时总结的“兼容并蓄，别立新宗”和“守而不僵，新而不流”两句话来激励自己，以此表述自己的学术思想。我认为，这既是经验之谈，又是哲学总结。时隔20年之后，在他90华诞之际，夏老师又深刻凝练了自己的学术之道，用四词八字予以概括：“兴趣、责任、中庸、系统”。他说，“中庸观和系统论是我的方法”，兴趣和责任是自己投身学术、心无旁骛的动力，动力和方法支撑了他全部的学术人生。

在夏老师心里，不管自己成为什么“家”，无论自己取得多大的学术成就，能做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才是自己人生最大的满足和幸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夏老师说：“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却如70多年前入党的少年那般，仍然怀揣着对党的赤诚初心，自豪幸福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永远做一名有责任有坚守的普通共产党员，这是夏老师学术人生的另一面情怀，也是其学术人生最深厚的底蕴和最强大的优势。这当然也是夏老师留给后学最大的一条智慧启发和最宝贵的一笔思想财富。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将无限放大其文化价值，福惠后人，泽被学术。

注释：

1 张艳国：《〈论语〉智慧赏析》，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13页。

2(4)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5月18日。

3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0页。

4(5) (6) (7)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255、373、3页。

5(8) (9) 夏振坤：《耄耋探索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138页。

6(10)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1-232页。

7(11) 张培刚：《序》，夏振坤：《中国农业发展模式探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1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9(13) (14) 夏振坤：《时代潮流中的中国现代化》，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卷首语”。

10(15) 夏振坤：《发展的多维视角——反思与前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页。

11(17) 参见张艳国：《夏振坤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述评》，《江汉论坛》1999年第2期。

12(18)张艳国：《〈颜氏家训〉精华提要》，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72 页。

13(19)朱虹：《传承弘扬学术思想，造福赣鄂两省——在夏振坤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社会科学动态》2018 年第 10 期。

14(20)夏振坤：《发展与文明》，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75 页。